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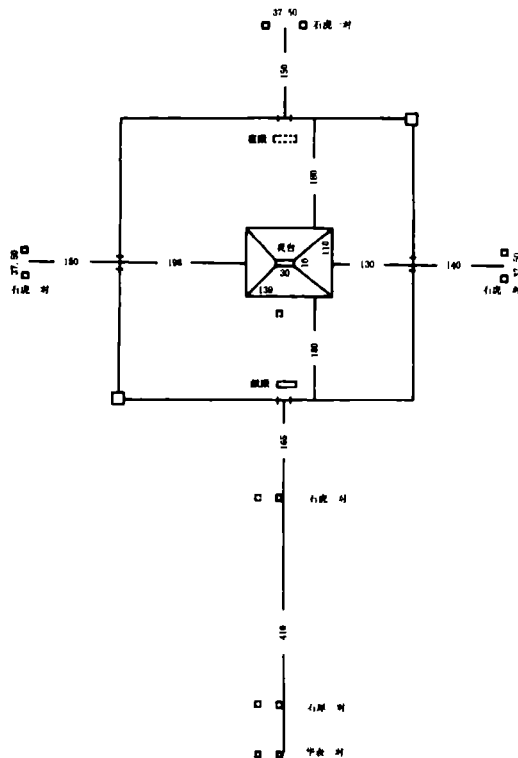
唐 献 陵 踏 查 记

巩 启 明

陕西省文管会于五十和六十年代曾对分布在关中地区的唐十八陵进行过调查^①，刘庆柱、李毓芳同志于七十年代中期对唐十八陵也进行过调查^②，但后来的二十年间，人为和自然的因素使多数陵区地貌、景观、建筑遗址、石刻情况有所变化，笔者近年在研究陕西帝王陵中，于1995年至1997年，曾三次赴三原县对唐献陵进行踏查，现将调查情况予以介绍。

唐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墓葬，位于三原县东北徐木乡永合村东北、秦窑村北、代庄东、永合一组西及富平县南庄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载：“高祖献陵在县东一十五里”。宋敏求：《长安志》卷20载：“高祖献陵在县东一十八里龙池乡唐朱邨，封内二十里”。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8载：“高祖献陵在三原县东北四十三里”。清末重修《三原县新志》载：“唐高祖献陵在县东北四十里白鹿原上。”后二者所记与今之实际里数大体相合。《长安志》所记唐朱邨，可能是今之唐村在塬下，《三原县新志》所记白鹿原即今之徐木原。《长安志》所记“封内二十里”即陵区范围的大约面积，若将全部陪葬墓包括在内，实际陵区面积就更大了。今日之陵区除存有高大的陵冢封土、陪葬墓及部分石刻外，陵园地面建筑荡然无存。

献陵陵台为覆斗形，位于陵园中部偏东，底边东西长139米，南北长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长10米，高19米（图一）。关于献陵的营建规划，唐太宗曾下



图一 唐献陵平面布局示意图

诏有司过论，决定按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的规模营建。现存高度与记载大体一致。现陵台四面坡上植有松柏，郁郁葱葱，四季常

青，整个陵冢保护完好，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有保护标志碑记，以示保护（图二、1）。

陵台四周筑有墙垣，为神墙，略呈方形，周垣东西长 467 米，南北长 470 米。调查中发现有的墙段夯层尚在，从暴露情况看，神墙底宽约在 2 至 2.5 米之间，夯层厚

12 至 20 厘米不等（图二、2）。沿神墙走向地面散布有大量瓦片及涂有白灰的墙皮，其中板瓦较多，筒瓦较少，偶有莲花瓦当残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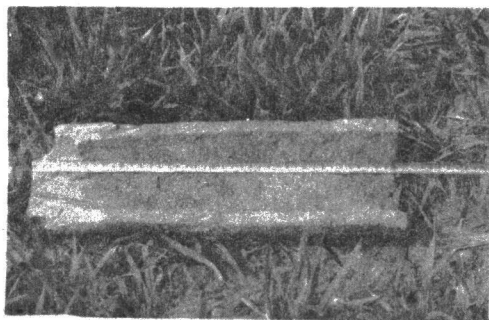
四面墙垣各辟一门，为神门，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司马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朱雀门与玄武门均距陵台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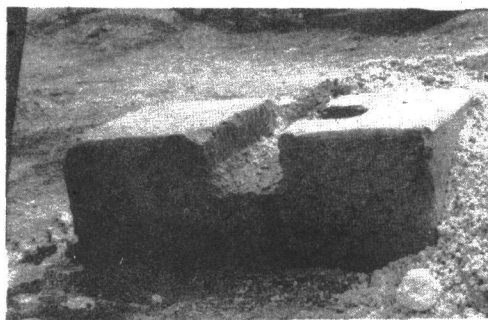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图 二

1. 献陵保护标志 2. 神墙夯层 3. 筒瓦 4. 青石门墩 5. 南神门外石虎 6. 北神门外西侧石虎

米,青龙门距陵台130米,白虎门距陵台198米。调查时发现西神墙中部的白虎门,暴露清晰,南北长19米,东西长14米,门外南侧有用条砖铺砌的散水,排列整齐,向南延伸有10多米长,门内南侧有铺地砖,有的砖面上有“御”字陶文。门址上堆积有大量板瓦、筒瓦残块。筒瓦中有一件完整,长40厘米,直径14厘米,可见形制之大(图二、3)。在附近之代庄村内路旁遗有青石门礅一件,形体硕大,长108、宽51、高42厘米,中部有凹槽,槽宽21.5、深15厘米(图二、4),可能是西神门所用之门礅石、后搬移至此的。其它三神门地表为农田,尺寸结构不详。据本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调查献陵时,东、西、北三神门均有阙址存在^③,不知何时夷为平地,今已不存。

陵园四隅有角阙设置,调查时发现西南角阙与东北角阙尚有残迹存在。农民耕地时于西南隅发现有夯土层,面积较城墙所占面积要大,可能是西南角阙址。东北角阙址,地面上尚有残迹,残存部分高出地面80厘米,有砖砌墙面五层,砖面以内为夯土层,墙面上抹有草拌泥一层,厚1厘米,草泥面上涂白灰,厚0.30厘米,白灰面上涂朱红色颜料。阙址上及其附近堆积有大量砖瓦残块,涂红白灰墙皮等。

朱雀门外为神道,即自朱雀门偏西处至华表,南北长575米,宽39.5米。神道东西两侧有大型石刻布置。

神道南按后来形成的唐代陵寝制度应有乳台、鹊台设置,献陵没有,但在陵园内有献殿、寝殿,陵园西南有下宫建筑。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约10米处,根据土质及瓦片散布情况推测,其范围大约东西长20米,南北长8米。遗址上砖瓦残块及石灰渣粒、红烧土块堆积相当集中。寝殿,位于玄武门内,现今地表遗有大量砖瓦残

块、石灰和红烧土块,其范围因未勘探难以确指。

下宫,位于陵园西南2.5公里之唐村北100米处的塬下,现存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长120米,现为苹果园。农民前几年挖坑种植苹果树时,挖出砖瓦残块堆积地头,有几十卡车之多。可以想见唐宋时期这里宫殿建筑之巍峨,北宋《新修唐高祖庙碑》云:“仍颁宠诏,就建灵祠,因献陵之下宫,据毕原之故地,鸠工岁时,不日而成。观其正殿,中蹲景福灵光之比也,回廊□丛未央、建章之类也”^④。

二

献陵封土前有清康熙二十年所建墓碑一通,高2.36米,宽0.85米,题曰:“唐高祖献陵”,保存完好。四神门外各有石虎一对,身躯高大,姿态凝重,大小形制略同,但保存现状各异。南神门外石虎,位于门址南165米处,东西列置,东侧的头向西,立于石座之上,保存基本完好。石虎身長2.75米、高1.80米,胸宽1.00米;石座长2.20米,宽1.15米,厚0.30米;础石长3.30米,宽1.70米,厚0.35米。虎足与石座连为一体,为一块整石透雕而成。颈下刻有年代及石匠名字铭文一段,铭曰:“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据文献记载,李渊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庚子卒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冬十月庚寅葬于献陵^⑤。可见“武德十年”当为“贞观十年”之误(图二、5)。西侧石虎于1959年迁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室展出,保存完好。石虎身長2.48、高1.70、胸宽0.85米;石座长2.34、宽1.14、厚0.25米;础石残。东神门外石虎,位于门址东140米处,永合一组村北,二虎南北列置,间距37.50米。南侧石虎已掩埋地下,石座暴露地表。北侧石虎、石座均被“文革”时砸

坏,现仅留残石块堆积原地。北神门外石虎,位于门址北150米处,南庄村西北隅、二虎东西列置,间距37.50米。东侧石虎掩埋地下,仅留石座于地表。西侧石虎、石座分离,石虎从腹部以下掩埋土中,虎头、虎身、虎尾出露地表,保存完好,身长2.50米(图二、6),础石完整,仍留原地未动,长3.30、宽1.80、厚0.30米。西神门外石虎,位于门址西150米处,代庄村内,二虎南北列置,间距37.50米。南侧石虎、石座分离,石虎腿和咀部残,虎身完好,身长2.70米;础石尚在,长3.25、宽1.75、厚0.70米,已断裂。北侧石虎,头、身、尾均完好,身长2.68米,腹部以下掩埋土中;础石稍残尚在地表,长3.10、宽1.68、厚0.63米。

神道东西两侧有石刻列置,从南向北计有华表一对,犀牛一对,间距39.50米。东侧华表,基本完好,通高7.40米,从下到上由础石、石座、柱身、柱顶组成。础石和石座均呈方形,础石长2.02米,宽1.98米,露出地表部分厚0.40米;石座长1.59米,宽1.82米,厚0.43米;石座之上有圆形石座一层,厚0.35米,并浮雕二螭龙,首尾相接呈环状,中央有榫槽圆窝一个;柱身八棱,下部最大棱面0.45米,各面均线雕缠枝蔓草花纹;柱顶为八棱顶盖,其上圆雕一蹲兽狮,腿残。西侧华表,地面仅存础石一方,长2.08米,宽2米,柱身已掩埋地下,距础石南3米处,柱顶于“文革”中被破坏。石犀位于华表之北70米处,东者完好,高2.12米,身长3.35米,体态硕大,生动形象,独角,瞋目,作走动状,体饰鳞纹,右前足之底板上,刻有铭文数字,已泯泯,残存“□祖怀远之德”字样,当初应为“高祖怀远之德”六字。石犀与石座连为一体,为一块巨石雕成,石座长2.64米,宽1.27米,厚0.24米。石座下为础石,已

残。于1960年已搬至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室展出。西侧石犀已掩埋地下。

当地群众反映,早年石犀以北还有依次排列的石人三尊,均属东列,皆面西,高2米多,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文官模样,惜已不存。

下宫遗址原有宋开宝六年(公元974年)新修唐高祖庙碑一通,不知毁于何时,但碑文尚存,被清王昶收编入《金石萃编》中。据载:“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广四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四字不等,行书,额题: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庙之碑,十二字篆书。”由当时唐□撰文,张仁愿书。碑文内容多系为李渊歌功颂德之词,同时将新修之殿字形容为可与汉之未央、建章二宫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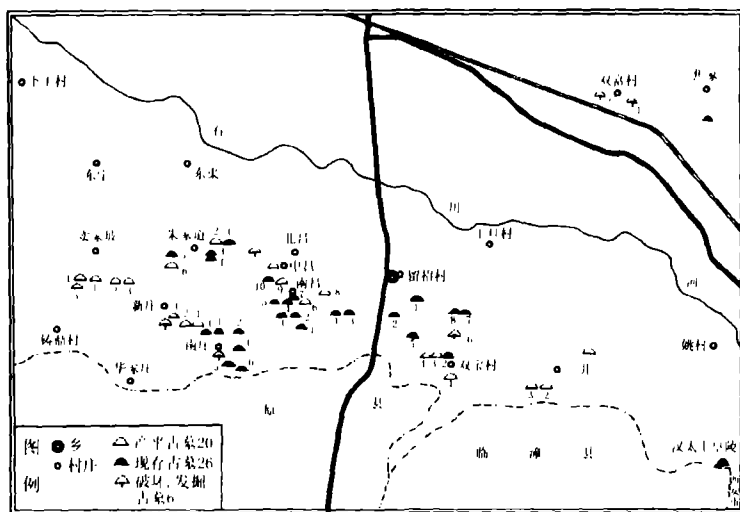
三

献陵陪葬墓集中分布在陵冢之北和东北的富平县吕村乡一带。吕村乡旧称荆山原,原面平坦、辽阔,土层甚厚,是上好的墓园之区。早年这里因是皇家陵区,大冢成群,松柏遍布,少有人烟,后来因人口增加,村落才逐步增多。正如当地民谣所称:“荆山原头四季青,松柏苍苍映太空,狐兔竞窜百鸟叫,墓冢崑崑罕人踪”,乃是一片陵园景象。

据《唐会要》卷21记载,原有陪葬墓25座,即:楚国太妃万氏、馆陶公主、河间王孝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诞、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道王元庆、郑王元懿、虢王元凤、鄆王元亨、徐王元礼、滕王元婴、邓王元裕、鲁王元夔、霍王元轨、江王元祥、密王元晓、并州总管张纶、荣国公樊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邱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茂、沈叔安。按当时陪葬制度规定,陪葬墓主的子孙亦可从葬,宫人亦可陪葬,实际陪葬墓就更多了。建国后,

经富平县文物工作者多次调查及近年来笔者复查，已发现尚存封土者 26 座，已经夷为平地封土不存者 20 座，已遭破坏及发掘清理者 6 座，合计 52 座（图三）。其具体位置

所在：三井村 3 座，均已平，其中 1 号位于村东北 500 米处，2、3 号位于村西南 300 米处。双宝村 8 座，现存 5 座，已平 2 座，发掘 1 座，其中 1 号位于村南 50 米处，已



3号位于村东南550米处,4号位于1号之西60米处,5号位于1号西南140米处。属于东上官乡的3座,其中焦家堡村1座,位于村南500米处,即淮南公主墓,墓志已出土,墓冢尚存。双富村2座,1号位于村东南,2号位于村西,均被毁,地面石刻尚存^⑥。

四

李渊,字叔德,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于长安。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祖父李虎曾助北周伐西魏有功,为柱国,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昉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独孤皇后是姊妹。由此,渊与隋文帝关系甚笃。文帝受禅时,渊为禁卫官,后任谯、陇、歧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及辽东之役又立战功。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次年为太原留守,与突厥战,屡战屡捷。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各地义兵蜂起,天下大乱,李渊次子李世民,心怀大志,说服李渊于当年四月起兵太原,兵力迅速扩大,十月围长安,军至20余万,军纪严明,甚得人心,十一月入长安,约法12条,废隋苛政,尊炀帝为太上皇,立杨侑(炀帝嫡长孙)为帝,渊总揽大权。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死于江都,五月恭帝禅位,李渊即帝位于太极殿,改国号为唐,改年号为武德元年。建国后的武德年间,统一全国的战争仍在顺利进行,李世民功高势显,遂引起兄长李建成、四弟李元吉等的嫉妒,并谋害李世民未曾得逞,又谋杀李世民,机密泄露,李世民决计发动玄武门之变。政变之后,李渊才委世民国事,七月立世民为皇太子,八月禅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贞观九年(公元636年)五月,李渊病死于长安大安宫之垂拱前殿,

年70岁。十月葬于献陵。庙号高祖,谥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八月,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5年)二月,加尊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唐朝的建立,李世民功劳最大,但李渊以前朝重臣,在乱世之中决策起兵灭隋建立新的政权,其作用亦无人可比。晚年及时禅位于李世民,退居太上皇地位,使李世民充分发挥其一代明君的作用,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推向颠峰,亦标是明智之举。

唐朝初期的各项制度尚未完善,多沿用前朝,陵寝制度也是一样。高祖李渊临死时下诏:“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⑦。在其遗诏中强调:“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⑧。太宗李世民为营建献陵“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汉高祖刘邦陵)故事,务在崇厚”。遂引起朝臣争议,秘书监虞世南两次上奏,陈述历代陵寝制度之得失,援引汉文帝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建议薄葬^⑨。太宗当时听取了这一建议的一部分,而未完全采纳,只是缩减了规制,既不按长陵高度,也不依霸陵山势,而是按东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的规格营建献陵。献陵的形制是“积土为陵”,是仿照秦汉的陵寝制度而建的。“积土为陵”的形制,封土高大,形如覆斗,即选择高阜之地,从地面向下深凿墓室,墓室古称“方中”,地面以上的封土称为“方上”。方中的建筑方法,是从地平面向下挖好墓穴,在墓穴中构筑成殿堂形状,然后在其上置炭石、堆沙、填土。木炭防潮吸水、沙石防盗。有的在地宫之上填以膏泥,以便密封与外面隔绝。方中的地面以上积土层层夯实达到一定高度为封土。后来仿照献陵“积土为陵”的唐代帝陵,还有敬宗李湛庄陵、武宗李漕端陵以及僖宗李儇靖陵。这是唐代帝陵主要形制的一

种。然而, 献陵仿照汉制是因为: 当时本朝的陵寝制度尚未完备, 二是唐初国势、财力尚不强盛; 而庄陵、端陵和靖陵倒是由于晚唐国势衰微, 财力不支, 朝廷政权惶惶不安所致, 尤其靖陵乃是草率为之。古制“积土为陵”者称为“山陵”或“山”的名称。因其高大如山, 故称“山陵”。“山陵”泛指国君帝王的陵墓。同时又有称“山”者, 但“山”作为帝王陵墓名称, 必须有实际山名。如秦始皇帝陵又称“骊山”, 汉高祖长陵又称“长山”。此后, 凡帝王的陵墓泛指为“山陵”或“山”。实际上“依山为陵”的帝王陵墓, 才是名副其实的“山陵”, 如汉文帝霸陵、唐太宗昭陵等。“积土为陵”的“山陵”只不过是因其形状像似高山而已^⑩。

唐朝凡有国邸, 多以宰相为礼仪使, 掌管山陵制度, 并由将作监负责设计、施工及供应各种建筑材料。其设计原则有二: 一是必须体现皇帝玉尊玉贵的极权思想; 二是茔地的选定、兆域的界限、规模的大小、陵园建筑设施及石仪内容等的平面布局和立体效应都必须体现当时的国势状况。献陵的营建集中反映了这些思想原则, 为以后诸帝陵的营造影响极大。太宗李世民为其父营建献陵的制度、思想确定后, 遂命当时宰相房玄龄负责“护高祖山陵制度”^⑪, 将作少匠闫立德负责设计施工营建^⑫。经过五个月的紧张施工, 建成的献陵平面布局: 陵台居中, 呈覆斗形, 四面围以神墙, 四神墙中部各辟神门一座, 有门阙, 周垣四隅设角阙, 于司马门内设寝殿, 朱雀门内设献殿, 朱雀门外设神道, 神道两侧置石仪, 陵园西南设下宫, 陵园东北设陪葬墓区。这样的平面布局, 对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陵园平面布局来说, 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也就是说它不仅继承了前朝的陵寝制度, 而且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富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从唐代整个陵寝制度来看, 献陵陵园的平面布局, 仍不完

善, 以至于后来的昭陵、乾陵才逐步发展完善起来。

帝王陵墓四周围以墙垣的制度, 创始于秦始皇帝陵, 其平面呈长方形, 有内外两重夯土墙垣。西汉继承秦制, 于诸帝陵四周围以夯土墙垣, 其平面呈正方形, 符合“以方为贵”的思想。东汉除光武帝原陵筑有四面神墙围成的周垣外, 自明帝提倡节俭薄葬以后不设周垣、代以“行马”(拦阻人马的木制警戒设施)。魏晋南北朝多因国祚较短, 战乱频仍, 国势衰弱的缘故, 对帝陵的营建多数从俭, 少数略加崇厚, 多数无神墙周垣设施。到了唐朝, 又承秦汉制度, 在帝陵四周围以墙垣。唐代帝陵无论是“积土为陵”或者是“因山为陵”, 除昭陵外其余各陵四周均围筑墙垣, 平面为正方形, 但受山区地形复杂的制约, 致使多数帝陵只能是大概的方形。

四面神墙设置神门的制度, 自秦始皇帝陵开始。秦始皇帝陵内城北墙开二门, 东、西、南墙各开一门, 外城四面神墙各开一门。西汉诸陵于四面神墙各开一门。唐代诸陵除昭陵因山势制约只设南门和北门外, 其余各陵均于四面神墙各开一门。唐陵城门的形制和结构, 根据勘查资料可以复原。献陵西门址面阔 19 米, 进深 14 米, 乾陵各门址规模较大, 面阔在 26 至 27 米之间, 进深在 13 至 15 米之间, 桥陵南北门址面阔 29 至 31 米之间, 进深在 10 至 11 米之间, 东西门址面阔在 25 至 28 米之间, 进深均为 8 米。献陵、景陵、光陵、崇陵等都有门墩石尚在, 大小尺寸形制相仿。这样的门址平面尺寸比例及门墩石大小来看, 复原起来的城门建筑形制, 不像是过洞式建筑, 而可能是四周围以墙体前后开门的过殿式建筑。这种过殿式建筑, 实际上应是一座殿堂, 只是它主要用作门罢了。

西汉诸陵的四神门两侧多数设门阙, 为三出阙。唐朝的献陵也设门阙, 昭陵因山势制约仅南北门设三出门阙, 自乾陵以后各陵

的四门均设三出门阙,较前不同的是其位置移到神门以外了,使陵园气势更加宏伟。唐代以前的陵园似无角阙的设置,自唐献陵开始除昭陵外,各陵的陵园四隅均设角阙,使陵园整体更加辉煌。

在帝王陵园内营建献殿和寝殿的制度,由来已久。商代和东周诸侯王的陵墓上都有殿堂建筑,称为享堂。秦始皇陵“起寝于基侧”,即将寝殿移建于基侧,今秦始皇帝陵封土之北侧有寝殿遗址。西汉诸帝陵园内都有寝殿建筑遗址尚存。唐初献陵和昭陵不仅在陵北的玄武门内设寝殿,而且在陵南的朱雀门内设献殿。据文献记载寝殿和献殿的用途,是皇家举行重大祭奠仪式的活动中心。《唐会要》载:“贞观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饌,阅视高祖及先后服饰之物”^⑬。此后,高宗谒昭陵在寝殿举行,玄宗谒昭陵在献殿举行。可见寝殿、献殿都是举行皇家祭奠活动的地方。自乾陵以后,陵园内只有献殿设置,祭陵活动也只能在献殿举行。

下宫,也叫寝宫。下宫是对陵寝所在的地宫而言,一般都设在陵城之外的西南方,唐代诸帝陵园都有设置。这是供墓主灵魂起居生活的处所,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宫人供养如常仪之处,同时也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以及宫人、官吏留守居住的地方。献陵下宫距陵五里,此后除昭陵外其它诸陵大体都遵从此制,或因地制宜略有不同。关中唐十八陵的下宫建筑,均已倾废,即其遗址也多遭破坏,近世以来也从未进行过实地勘探和发掘,其建筑布局、结构、规模均不得其详。但据《唐会要》卷20所记来看,贞元十四年(公元799年)遣右谏议大夫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

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茸而已”。可以想见原来的建筑规模比此数量更多。另据近几十年来研究者踏查测量过的资料来看,献陵下宫遗址南北长100米,东西长120米,昭陵下宫遗址面积南北长334米,东西长237米,乾陵下宫遗址南北长298米,东西长282米,桥陵下宫遗址南北、东南各长300米。由此可见诸陵下宫占地面积之大,实为一组规模宏伟的建筑群体,系整个陵园范围内的一项重要设施。

献陵四神门外各设石虎一对,于神道两侧从南向北设置华表一对,石犀一对,石刻品类极简,但雕刻工艺及其价值极高。古代帝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起源甚早,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七引《物原》载:“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狔、虎、羊、马”。又引《三辅黄图》载:“青梧观在五柞官之西,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胁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这是说周秦帝王陵已置石人,石兽等石刻,但这些记载至今未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西汉帝陵有否石刻布置,无论是文献记载或者是考古工作均未发现。东汉帝陵始有石刻布置,现有石象仍遗地表。魏晋帝陵多强调隐蔽,无石刻布置。南北朝时期,陵寝制度逐渐得到重视和恢复,北魏孝庄帝静陵的前面于1976年出土石人和石人头各一件,西魏文帝永陵前有石人、石兽各一对。南朝宋、齐、梁、陈诸帝陵前一般都有石兽(麒麟)、石华表及石碑等石刻布置。这些石刻,虽说陈设简单,品类不多,但由于形体高大,造型庄重,总体气势则显得威武壮观,表明此时帝陵布置石刻的制度已经初创。到了唐代,帝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才逐步完善。献陵石刻总的看来,无论品类或数量以及陈设位置都比前代有所发展,对后世也颇有影响。至于献陵四神门置虎,神道置犀的作法,均不见于前代,这可能有三种原因所致:一是古人迷信鬼神,传说有一种叫做罔象的怪兽,好食

死人肝脑,而罔象畏虎及柏,故在墓上植柏和刻置石虎,借以辟邪之义^④。二是李渊信奉道教,自然不能采用佛教圣物狮子置于墓前。三是古人信祥瑞,麒麟、象、犀都被视为神异嘉瑞之物,有镇山、镇水的作用,秦时李冰在四川曾作石犀以镇蜀中江水,献陵神道置巨大石犀一对于陵前,可能也是取自镇山镇水借以祥瑞之义^⑤。

唐朝的陪葬制度,仿自汉代,太宗李世民极为重视,于贞观八年(公元635年)下诏:“佐命功臣,义涂舟楫,或定谋帷幄,或推身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汉代将相陪附,又给东园秘器,笃忠之义,恩义深厚。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十一年又诏曰:“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二十三年又诏:“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⑥。由此,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陪葬甚多,前者52座,后者竟达167座,极盛一时。自高宗、武后乾陵开始,或因皇帝昏庸无能,或因君臣不睦,或因皇亲骨肉相残,或因奸党横行,或因内忧外

患,或因国势衰微,致使发达兴旺的陪葬制度,犹如昙花一现,而走向了每况愈下的境地,逐渐减少,到晚唐甚至不复存在了。

唐高祖李渊献陵,是唐朝第一座皇帝陵墓,其陵寝制度既源自前朝又有所发展,各项设施都为后来陵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打下了基础,甚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 释:

- ①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3期(1980年)。
- ②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③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
- ④王昶:《金石萃编》卷124。
- ⑤⑦《旧唐书·高祖本纪》卷1。
- ⑥富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平地方志通讯》,(内刊),1986年。
- ⑧《唐大诏令》卷11。
- ⑨《旧唐书·虞世南传》卷72。
- ⑩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下篇。
- ⑪《旧唐书·房玄龄传》卷66。
- ⑫《旧唐书·闫立德传》卷77。
- ⑬《唐会要·亲谒陵》卷20。
- ⑭高承:《事物纪原》卷9。
- ⑮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唐太宗与昭陵》,1985年。
- ⑯《唐会要·陪陵名位》卷21。

(上接96页)

所有考古学专家和修复专家的重视:科学、认真地进行清洗,将所有的资料都收集起来。

本文是我们在陶器修复过程中对清洗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和思考,兹可藏拙,一陈管见,希望大家予以指正。

注 释:

- ①U·赫尔兹《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铜锡杖的修复》,《修复与保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 ②摘自(H Cartre·A·C mace" La, Tomba di Tutankhar-num" vol. 1. 1924, page124)。